

“汝要学好诗，工夫在诗外”

——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交际文化知识

“詩をマスターするには、詩以外の事柄に時間を費やさ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外国語としての中国語教育の中の交際文化の知識を議論する

池 玉杰 高 风平

要旨: 言語は文化の表現形式でもあり、文化の重要な要素でもある；しかし文化は言語表現の根本的な内容である。言語と文化はお互いにたよりあう共存関係にあるので言語の勉強は異文化の勉強と切り離すことができず、同時に行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異文化の勉強と同時的に行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ように求めて、言語の勉強は文化の学習以外に独立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そのため、中国文化——特に交際文化——對外中国語の教育の中で1つの無視できない構成部分で、特に民族的なものを深く溢れている文化のイメージと文化的な語彙、更に十分重視すべきである。

キーワード: 中国文化；對外中国語の教育；交際文化；文化的な語彙；

引言

文化は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的一个问题，许多学科都从文化的角度对自身进行新的关照，或以自身的学科优势与独特的视角审视文化，“文化热”久盛不衰。语言作为文化的一个主要载体，其文化内涵、文化形态和文化功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从文化角度重审语言、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为这些领域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问题及其研究便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受到了外语教学界的广泛重视。

语言是一种社会文化因素，每个民族由于生产方式、文化素养、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因素不同而形成独特的民族文化，这些因素也必然反映在民族语言里，于是在民族语言里就增加了一层文化色彩，这就产生了语言的社会化意义（金惠康，2004：53）。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离开了文化，语言便只剩下抽象的形式外壳。而语言学习的层次愈高，除了语言形式更加复杂以外，其负载的内容文化含量亦越高，而且越来越以专门的文化面貌出现：文学作品，报刊文章，哲、经、史的论文等。在丰富多彩的文化内容与文化形式的推动下，语言学习的形式阶梯与基础阶段相比，越来越模糊，同一意义的语言表现方式更多、更灵活。丰富的文化知识为语言表达提供了大量潜在的可能性。不仅仅是在“学语言”中学习有关交际的“交际文化”，而且是学习了必要的文化知识才会在交际中随机应变地以各种恰当得体的语言来使交际获得最大的成效。包括众多语法点项在内的语言形式和语言技巧是有限的，但在丰厚的文化知识充实包装之下却可以化为无限。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既要重视语言技能的层次性，又要重视高层次语言技能中越来越突出的文化性，交际文化是语言教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语言学习者的“诗外功夫”（周思源，1998：10）。

1. 语言与文化

1.1 大文化与小文化

在对语言和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上，有两种不同的切入途径，一种是“语言与文化”，另一种是“文化中的语言”（胡文仲，1999：281）。两种提法之间有明显的差异和矛盾：如果按照“语言与文化”一说，语言与文化两者并列，语言是否还属于文化的范畴？如果按照“文化中的语言”一说，语言从属于文化，又如何界定语言与其他文化现象的关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的语言学家提出将文化分为两大范畴：大文化和小文化。语言与大文化的关系是从属关系，与小文化的关系是并列关系。

语言是文化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如果把文化作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总体概念来看，语言属于人类总体文化，即大文化的范畴。但语言在总体文化中的地位比较特殊，与总体文化中的其他文化现象（即小文化）都有某种对应的关系。因此可以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与人的交际工具，也是使人与文化融合一体的媒介。它随着人类的形成而形成，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人类社会的变化而变化。

从小文化的角度来看，语言和文化是同步发生的，没有语言就没有其他文化现象。语言是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文化的发展也促进语言的发展。有了语言，人类就有了文化。自古以来人类社会积聚下来的文化遗产给语言留下了深刻的烙印（陈福康，2002：53）。

1.2 交际文化

最早提出交际文化这一概念的是张占一先生：语言教学中的文化背景知识从其功能角度来看，应分为两种——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所谓交际文化，指的是在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熏陶下的人，在交际时，由于缺乏有关某词、某句的文化背景知识而发生误解，这种直接影响交际的文化知识可称之为“交际文化”。

把交际文化置于对外汉语教学的背景中，它包含以下层面：1. 对外汉语教学的：即对比的，

必须存在于不同的文化群体之中。2. 交际文化的：其中包括交际的，即必须是个人参加的现实行为和文化的，即存在于语言或非语言背后的规范和准则，描写时使用“文化意义”来说明。

交际文化无论对本文化群体来说，还是对另一个文化群体来说，都是客观存在的。所不同的是，对前者来说，它的存在是熟视无睹的，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它与这个文化群体融为一体。而对另一个文化群体的成员来说，则往往由于不了解一些语言现象的文化意义而拘泥于其语言意义，导致交际失败。故对交际文化的认识可以分为两个层面：1. 对本文化群体内部而言，交际是不言而喻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说，交际文化可以定义为：制约本文化群体成员的交际行为的一系列规范或准则。2. 对另一个文化群体的成员来说，交际文化是陌生的，必须作为知识来学习才能得到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讲，交际文化可以更具体地定义为：交际文化是干扰另一个文化群体成员与本文化群体成员之间的交际行为的一系列规范或准则。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用“语言意义与文化意义”、“实体意义与文化意义”这两组概念来分析交际文化，前者是语言的，后者是非语言的。

所谓文化意义是指某一文化群体对客体（语言、非语言）本身所做的主观评价。如果两个文化群体的评价不同，就会引起干扰，“你去哪儿”，作为客体，它与英语的“Where are you going”是一致的，但文化意义却大相径庭。这里语言意义即所谓概念意义，而文化意义则相当于感情色彩、风格意义、比喻意义等。

还有一种情况，即一个文化群体里的某些词、短语、句子是由于特殊的文化背景形成的，我们称之为文化词，这类词在另一个文化群体里是零形式，那么在教学中既要给出语言意义，也要给出文化意义，比如，“包公”、“红娘”、“八抬大轿”。

实体意义与文化意义是就非语言方面而言的。如“红色”在不同的文化里实体意义是一致的，但红色在中国文化里具有喜庆的文化意义，

而在美国文化里则没有该意义。

交际文化所涉及的内容很繁杂,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即语言交际文化和非语言交际文化。语言交际文化包括:1. 是否是被禁止的语言文化行为,如询问年龄、收入、私事等,在汉语里是可行的,在英语中则是不妥的。2. 积极的文化行为,如称谓、敬语、谦语、套语、礼貌与非礼貌、委婉语等。3. 语言意义相同,文化意义不同,如数量词、颜色词、比喻用语、招呼语、问候、告别等。4. 文化词,如成语典故、歇后语、惯用语、俚语。非语言交际与文化包括:体态语,如空间、距离、手势、腿势、头势、接吻、拥抱、握手、嘴势等;颜色,如红、白、黑、紫、绿、蓝、青、黄;社交礼俗,如送礼受礼方式、服饰、邀请、访问、招待、宴会、聚会、约会、赴约等;日常生活,如购物、付款、交通、饮食、娱乐、起居、时间安排等(孟子敏,1998:149)。

2. 对外汉语教学

语言与文化相依相随,息息相关。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结晶,是反映文化的一面镜子。语言既是文化的表现形式,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化则制约着语言形式,它不断地将自己的精髓注入到语言之中,成为语言的文化内涵,成为语言表现的基本内容。语言与文化相依共存的关系要求第二语言的学习与第二文化的学习必须同步进行,语言学习不能独立于文化学习之外(王建勤,1998:96)。

汉语是世界上最发达、最丰富、也最具表现力的语言之一,中国文化也是世界上最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和最光辉灿烂的文化之一,这样的文化储入这样的语言,使汉语具有深广厚重的文化积淀,宽广浩瀚的文化内涵。许多汉语语言成分只有挖掘出它所包含着的中国文化内容,才能得到完满的诠释(林国立,1998:21)。汉语的语言单位,特别是词语,体现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态度,记录下民族和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他跟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呈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个性。如“月下老人”、“马

大哈”、“台柱子”、“穿小鞋”、“戴高帽”、“大锅饭”、“跑龙套”、“下海”、“跳槽”、“触电”、“打白条”、“北漂”、“走过场”、“对台戏”、“万元户”、“朝秦暮楚”、“白手起家”、“打退堂鼓”、“相濡以沫”等等大量词语,如果不探究其文化内涵,单从语言形式上是无法搞清其深层含义的,也不是简单地用媒介语对译就能解释其文化意义的。不了解相关的文化因素,就无法进行有效的交际。

“人们在习得第一语言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种自我认同。这种自我认同与第一语言息息相关,在学习第二语言的时候就会表现出来,影响第二语言的学习,形成一种自我疆界(ego boundaries)。学习第二文化的目的就在于超越这种自我疆界,或者说扩展这种自我疆界,清除两种文化接触时所产生的障碍,使自己处于目的语国家人们的位置和思路上,达到移情(empathy)的理想境界,这就获得了第二个新的自我认同(李润新,1998:66)。”第二语言与第二文化的同步学习正是为了达到获得第二个新的自我认同的理想境界。

中国文化对汉语有着强固的制约作用,汉语本身具有异常的储存本民族文化精华的功能,这就决定了在汉语学习中,要格外地重视中国文化的学习(李润新,1998:58)。

2.1 汉语中特有的文化意向

文化意向凝聚着各个民族的智慧,是历史文化的结晶,相当一部分文化意向还与各个民族的传说,以及各个民族初民时期的图腾崇拜有密切的关系。在各个民族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他们不断出现在人们的语言里,出现在一代又一代的文艺作品里,慢慢形成一种文化符号,具有了相对固定的、独特的文化含义,有的还带有丰富的、意义深远的联想,人们只要一提到他们,彼此间立刻心领神会,很容易达到思想的沟通。文化意向有许多种表现形式,可以是植物,如汉民族语言里的松树、梅花、竹子、兰花、菊花等;也可以是一种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或只是在传说中存在的飞禽走兽,如乌鸦、喜鹊、龙、麒麟等;

还可以是成语、谚语、典故、或某个形容性词语中的形象或喻体，如“画蛇添足”、“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一什么时候吃你的喜糖啊？一八字还没一撇呢。一那我来做你的月下老吧。”这里的“蛇足”、“诸葛亮”、“喜糖”、“一撇”、“月下老”都已取得了特定的含义；有时文化意象甚至可以是某个数字，如汉语中的“三”含有“众多”的意思：三思而行，而“八”因为与“发”谐音，故有“发达”、“发财”的意思。

受各自的生存环境、文化传统的影响，不同民族会赋予相同的文化意向完全相异、甚至截然相反的含义。在一种语言中带有褒义、正面意义的事物，在另一种语言中可能就成了贬义、反面意义的事物；或者，虽然意义不是截然相反，但至少也是大相径庭（谢天振，2003：181）。用语言学家的话来说就是：“世界各民族人们看到的同一客观现象，不同的民族语言会给它刷上不同的颜色。”即所谓的文化意象的错位。

比如，在不少民族的文化中都有“龙”的意向。在汉文化中，龙是皇帝的代表，是高贵神圣的象征。汉民族传说中的龙能呼风唤雨，扭转乾坤，来无踪，去无影，神秘叵测，令人生畏，所以龙在汉语文化中又是威严、威武的象征。与之相应的，许多与龙有关的词汇也就因此带上了高贵神圣的色彩：真龙天子、龙颜、龙宫、龙袍、望子成龙。但这样的文化含义是汉语所独有的，其他民族并不具备。如在英语文化中，龙是一种凶残的猛兽，是恶魔的象征。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若不强调这类意向的文化含义，就会造成交际障碍。

又如，在汉民族文化中，“狗”总是一个受到鄙视、咒骂的对象，与“狗”有关的词语几乎都带有贬义，诸如“狗胆包天”、“狗急跳墙”、“狗血喷头”、“狗眼看人低”、“狗仗人势”、“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狐朋狗党”等等。但在西方文化中，狗却是“忠实的朋友”，甚至被视为家庭成员。

再如，在汉民族文化中，蝙蝠是吉祥、健康、

幸福的象征，而在西方文化中它却象征着丑陋、凶险；“海燕”被中国人视为搏击风浪的勇士，但在西方文化中却象征着“凶兆”，或指“幸灾乐祸的人”；“喜鹊”在中国是吉祥的象征，而在西方人眼里却是“饶舌妇”，甚至“小偷”的意思；被中国人视为不祥之物的“猫头鹰”，在西方人眼里却是“智慧”的化身；中国人称作凌波仙子的水仙花，在希腊神话中象征着自恋；中国人用来借指“高雅、脱俗

的兰花，在英语中由于词源学的原因，有些人会羞于提及这个词。

世界上各民族人民都向往幸福平安、富裕美满、健康长寿，崇尚坚毅、纯洁、高雅的高尚情操和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这些观念都会渗透在民族语言的词语中。汉民族的上述观念和心态在汉语词语中有独特的表现形式。

“鸳鸯”雌雄终生相伴，因而用以象征恩爱情侣。“松”、“柏”因其四季常青被赋予长寿和不朽的象征义。“竹”因其挺拔而中空有节，所以用来象征正直、坚毅、有气节。“梅”喜在严寒飘雪的冬季绽放，具有迎风傲雪的品格，因此常用以象征高贵、坚韧不屈。“菊”因在万物凋零的秋末初冬方显盎然生机、幽香清雅而被赋予高傲、雅洁等象征义。“冰”和“玉”因其洁白纯净，所以常用于象征人的品质真诚纯朴。

联想是人类的一种思维活动，指通过想象在相关事物之间建立起某种意义联系，即由此想到彼。联想意义是借助联想凝固在词语中的文化信息进行信息传递的。由于受民族文化的孳乳，代表同一事物或概念的词语在不同语言中联想义的有无情况是不同的。

汉民族会由“荷花”联想到“出污泥而不染”、正直纯洁的品格；会由“月亮”联想到宁静、美好；会由“蝴蝶”联想到生死相守的爱情。在外语的对应词语中，此类联想义常常会荡然无存。

色彩义在不同的语言中一般都具有联想义，但由于文化传统的差异，不同语言对色彩的联想义不尽相同。“红色”在汉语中有喜庆、欢乐、顺

利、成功、革命等联想义，因而传统的中国婚礼上，新娘着红装、洞房贴红喜字，而英语的 red 则有战争、流血、恐怖等联想义。在西方国家，白色有纯洁的联想义，因而新娘的婚纱是白色的，而汉语中白色却有致哀的联想义。

2.2 汉语中特有的文化词

语言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具有传达认知成果、交流信息，以及表达感情、意义、愿望等功能。语言之所以能发挥这样的功能，在于语言是音义结合体（黄河清，1998：219），语言的词汇系统负载着文化信息。词汇受到民族的社会状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词义是文化的反映，词义包含文化因素，是文化的积淀，透过词汇可以窥见民族文化的状况，因此词汇是民族文化的化石。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有共性，也有个性。一个民族的文化中独具的部分体现在词汇系统就是文化词语，即别的语言中无法对译的词语，或者说是别的语言中很难找到的，与之完全对应的“非等值词语”（谭载喜，2000：59）。

文化词语是民族文化个性的体现，是与别的语言比较以后的产物。一般而言，两种语言在系属上离得越远，彼此的文化词语数量就越大，交际障碍也就越多。汉语与英语没有亲缘关系，因而汉语的文化词语对英美学生来说，理解不易，使用更难，向他们讲解蕴含在汉语语义系统中的，反映汉民族文化特征的文化词语，对于培养学生跨文化的交际能力至关重要。

2.2.1. 特定自然地理环境中生成的词汇。如“梅雨”（烟花三月）、“戈壁滩”（大漠孤烟）、“长城”（众志成城）等等。这些表述都是汉语中独有的，若不了解其中特定的文化内涵，外国学生便无法理解像“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这类触景生情的诗句，更无法理解文学作品中一系列对梅雨描写的言外之意（金惠康，2004：59）。同样，没有见过戈壁滩和长城的人，也不可能单凭语言描写就得以领会“秦时明月汉时宫”和“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意境的。

2.2.2. 特定物质生活条件下生成的词汇。如“油条”、“黄粑”、“醪糟”、“大褂”、“旗袍”、“吊脚楼”、“四合院”、“堂屋”等特定文化中的特有词汇，如果不接触实物或借助图片或图像，单纯的语言讲解只能是隔靴搔痒。

2.2.3. 有关华夏文化传统和人文遗产的词汇，如“黄帝陵”、“西安钟楼”、“大雁塔”、“法门寺”、“玉门关”、“六和塔”，以及“敦煌莫高窟”、“黑山白水”、“秦巴沧桑”、“海滨邹鲁”、“燕赵豪情”、“秦淮古韵”、“西关人家”、“南国红豆”、“楼兰魔鬼城”、“西蜀栈道”、“纳西古乐”、“摩梭母系遗风”、“闯关东”、“下南洋”、“新疆军垦”等，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渊源、文化变迁及人文风采，若没有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面对这些词语，异域文化的人们无异于面对“丈二和尚”。

2.2.4. 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或政策下生成的词汇。每个民族都有一套自己特有的制度词语，这增加了各民族间相互了解的困难。“仁、礼、义、节、中庸”等词语表达了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认为合乎社会需要的行为规范，是其它国家所不具有的。

再如“科举”、“县衙”、“七品官”、“干部”、“支书”、“计划生育”、“上山下乡”、“农转非”、“吃公粮”、“大集体”、“合同制”、“民工”、“外来人口”、“个体户”、“下放”、“双规”、“改革开放”、“一国两制”、“双向选择”、“离休”、“西部大开发”等，就是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所涌现出来的独有的，与特定制度、政策相关的词语，若不了解相关的制度、政策体系及其历史背景，这些无法在其他文化的语言中找到对等词语的词汇就只能让外国人望洋兴叹了。

并且，汉语的制度、政策词语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发展演化的产物，能产性强，在形式上多具有简缩性，不了解中国的社会情况和这些制度、政策词语结构上的特点也会造成理解或运用的困难。

2.2.5. 社交词语是在社交场合使用的词语，其范围很广，包括招呼语与道别语、致谢语与致

歉语、对恭维和赞扬的反映、致歉与敬辞、禁忌语等。社交词语是人类语言的一般普遍现象，它的主要功能是给与对方情感态度方面的信息，以维持正常的人际关系（崔永华，孟子娟，1998：66）。社交词语也是一种很有民族特点的词语，不同民族之间有较大的差异，在跨文化交际时很容易引起语用失误。

汉语的招呼语与道别语最突出的特点是，除了表示尊敬之外，多表示关切、关心对方的健康、工作、生活、学习等方面，与人见面时常说：“身体好吗？”“忙吗？”“工作/学习怎么样？”；道别时常说：“慢走！”“走好！”“路上小心点！”这些问候语多是出于关心，充溢着关怀和友爱之情，而英语中的招呼语常用“Good morning!”“How are you?”或“Lovely weather, isn't it?”等一类谈论天气的话语。道别时除了“Good-by!”之外，会说一些祝愿的话，如“Wish you a pleasant trip!”英语民族的问候语尊敬多于关怀，他们一般不对别人的健康、工作、生活等方面问这问那，在他们看来这些都属于个人隐私，问及这些情况是失礼的。

在致谢语方面，汉语的“谢谢”无论从使用频率，还是使用范围上讲都远不及英语的“Thank you!”。汉语中一般不对亲朋好友说“谢谢”，否则显得生分，而英语中即使是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也经常用“Thank you”相互致谢。另外，在中国服务对象经常向服务者说“谢谢”，而英语中则相反。

对恭维和赞扬的反应，英美人的表现是欣然接受，而汉民族以谦逊为美德，在收到恭维和赞扬时多用“哪里、哪里”“惭愧、惭愧”、“不敢当”、“您过奖了”等来应答，以表示礼貌和自谦。若不了解这些，其内层义很容易发生语用失误，如这样一段对话：

—您夫人真漂亮！

—哪里，哪里。

—全身上下都漂亮。

中国人尚谦逊，讲礼貌，表现在语言中即谦

辞和敬语的使用，很多这类词语，如“光临”、“请教”、“讨教”、“赐教”、“斧正”、“大作”、“高见”、“愚见”、“管见”、“拙作”、“薄酒”、“便饭”等，都无法在英语中找到对等词，而且若不了解这些词语的语用功能，很容易形成交际障碍（梅立崇，1998：196），不善自谦的英美人会以为“愚见”真的不高明，“便饭”真的很简单。

结语

语言的指代物体或现象是通过文化结构来实现的。生活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人们，对同一语音或文字符号的理解是不同的。辨别词语的语义指代的能力依赖于对该语言文化的了解程度。对语言文化了解得越透彻、越详细，辨别能力就越强。反之，辨别能力就越差。尤其是民族文化环境中孕育出来的特有文化词汇和文化意象，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并包含了大量的文化特征和文化背景，而且具有鲜明的形象和比喻，带有浓烈的民族特点和地域色彩，明显地反映一个民族在各方面从古到今的人文状况，并且经常伴有“言外之意”，了解和掌握这些语言中的精华，既能提高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又能提高其文化能力，而文化能力的提高反过来又会强化语言能力。因而，语言教学必须语言与文化并重。

参考文献：

- [1]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53.
- [2] 崔永华, 孟子娟. 词汇文字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M]. 北京: 北京语言与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8: 66.
- [3] 胡文仲. 跨文化交际面面观[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281.
- [4] 黄河清. 关于汉字文化圈的思考[A]. 中国文化与世界[C]. 耿龙明主编.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8: 219.
- [5] 金惠康. 跨文化交际翻译续篇[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 2004: 53, 59.
- [6] 李润新. 第二语言教学与第二文化教学[A].

- 对外汉语教学与文化[C]. 周思源主编. 北京: 北京语言与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8: 58, 66.
- [7] 林国立.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体系[A]. 对外汉语教学与文化[A]. 周思源主编. 北京: 北京语言与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8: 21.
- [8] 梅立崇. 汉语的国俗词语[A]. 词汇文字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C]. 崔永华主编. 北京: 北京语言与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8: 196.
- [9] 孟子敏. 交际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A]. 对外汉语教学与文化[C]. 周思源主编. 北京: 北京语言与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8: 149.
- [10] 谭载喜. 翻译学[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59.
- [11] 谢天振. 译介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 181.
- [12] 王建勤.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研究[M]. 北京: 北京语言与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8: 96.
- [13] 周思源. 对外汉语教学与文化[A]. 北京: 北京语言与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8: 10.

个人资料:

高风平, 女, 籍贯山东, 生于1961年, 1984年毕业于西安外语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专业, 1987年于四川外国语大学完成研究生课程, 1999年晋升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 比较文化; 现任教于渭南师范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已发表论文26篇, 主编、参编教材6部, 完成省级、院级重点科研项目等4项。

通讯地址: 陕西, 渭南师范学院英语系, 邮编: 714000

家庭住址: 陕西, 渭南市教研所院内(东风街12号), 邮编: 714000

电话: 0913-2037868 (宅) 13991670185 (手机)

电子邮件地址: sxwngfp@sina.com

chi@tc.nagasaki-gaigo.ac.jp